

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

陈 民

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，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。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，素具爱国爱乡优良传统的海外华侨，与祖国同胞敌忾同仇，共赴国难。他们出钱出力，请缨杀敌，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。新加坡华侨、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，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只身回国组织阵地救护队，创建救护总站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，作出极其可贵的贡献，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实例。

林可胜，西名罗伯特·林(Robert K.S.Lim)，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，祖籍福建省海澄县（今龙海县）。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医生、社会活动家林久庆，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和随身医生，后任厦门大学校长；母亲黄端琼是著名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。由于家学渊源，林可胜8岁就被送往英国爱丁堡上学，中学毕业后考进爱丁堡大学，专攻医科。临毕业前，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林可胜应征服役，被分配在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印军医院当外科助理。4年紧张的战地医护工作，对他后来在祖国创办救护总站，无疑是很有裨益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林可胜复学，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，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的学位，并留校当生理学讲师。1920年与1924年，又先后获得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的学位。1923年，曾领美国罗氏基金会研究员衔，赴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。

1925年秋，立志为造福人类而献身于医学科学的林可胜，应聘回到了祖国，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，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，其时年仅28岁。当时少数美国教授颇不以为然，常故意与他为难。有一次林可胜作有关大脑结构与功

能方面的学术报告，当场一位美国神经科教授有意提出一个相当刁钻的问题，语气甚为轻慢。林可胜立刻拿起几种彩色粉笔绘出大脑结构，针对问题作了详细解答，并附带提出一个别的问题反问，该美国教授却无言对答，十分狼狈。从此以后，美国人再也不敢小看他了。^①林可胜在协和任教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。这几十年间，他刻苦钻研，锐意创新，在科研、教学、培养人才等方面，都有突出成绩，使我国的生理学研究达到世界水平。他多次在英美各国生理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，蜚声国内外。1926年，他创建“中国生理学会”。第二年，又创刊《生理学杂志》并任主编。1928年至1930年，任中华医学会会长。他在消化生理学和痛觉生理学两方面，都是先驱，是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。^②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的炮声震撼着北平，林可胜毅然走出书斋，准备奔赴抗日的最前线。为了免去后顾之忧，他携子女去新加坡^③，将孩子安顿后即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，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。随着战争的发展，鉴于战争的持久性和医护人员的紧缺，他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，除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训练示范病房以培养战地医护人员外，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械制造厂。当时的卫生人员训练所，实际上集中了医学各方面，包括基础医学在内的专门人才，如荣独山、容启荣、张先林、周寿恺等“协和”早年毕业生，其规模之大，人才之众，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，这说明林可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组织领导才能。由于他的国际声望，救护总站

① 张锡钧：《回忆中国生理学先驱林可胜》，载《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20页。

② 孟昭成、王志钧等：《纪念卓越的生理学家林可胜》，载《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》，第117页。

③ 林可胜的第一位夫人玛格丽特（Margaret）系英国苏格兰人，于1936年在协和医院病故，遗下一子一女。卢沟桥事变后，林可胜把子女安置在新加坡他父亲处。一个月后，他只身回国参加抗日战争。他这一奔赴国难的爱国行为，在新加坡华侨中颇得好评。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，他和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儿张精英在上海结婚。

得到国际进步团体、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。总站始终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援和帮助。“同盟”曾派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与救护总站保持联系，经常对红十字会的工作和伤病员及难民情况作出书面报告，及时对外报道宣传^①，从而募到大量的捐款和医药物品。救护总站先后派遣了100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，并在五个战区设立分站。抗战初期，前线由于缺医少药，伤兵得不到及时的医护，往往轻伤转重，重伤致死，造成不应有的伤残与死亡，严重影响到士气和战斗力。正如保卫中国同盟的代表1938年夏天视察南昌附近的伤兵收容所时所描述的：“那里活像一幅地狱图。那些军服上血迹斑斑的伤兵，被炸弹炸掉了手脚，身体半裸着，被收容在几个临时搭成的脏房子里，挤得满满的。医师告诉我：头部和腹部中弹，便没有什么希望了。即使是轻伤，在医院生疽死去的也不少。”^②自救护总站在前线设立战地医院后，情况大有改进，伤兵运到后，及时加以医治，轻伤者医至痊愈即重返战场，重伤员则经过紧急处置后，转移到后方医院。

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，大批伤病员涌向后方，由于卫生条件差，大多数官兵患有皮肤病，痛苦不堪。当时林可胜正移驻湖南祁阳，他把大汽油桶改装成锅炉，设置成简易灭虱治疥站，在56个后方医院进行灭虱、治疥，并给予特别营养，疗效显著，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。

1940年夏，林可胜亲自率领医师，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，当时有许多地区不通公路，全靠步行，盛夏烈日下，他时常光着上身，头包白布，走在前头。每天午饭后，他就小村的长凳上躺着歇息，他训练自己该睡就睡，要醒即醒，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。他们行走了70天，回贵阳后就拟定了一个“水与污物管

^① [德]王安娜，《嫁给革命的中国》（龙翔译），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20页。

^② [德]王安娜，《嫁给革命的中国》，第225页。

制计划”，主要是针对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预防，先在长沙前线试行，后也推广到各战区，从而减少了军队的传染病，这对改善广大官兵的健康状况，增强部队的战斗力，起着积极的作用。他认为，部队驻扎乡村，不仅部队本身的环境卫生要搞好，还要训练部队改善乡村的环境卫生，将来胜利后，大批士兵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便可把农村的卫生做好。这样，现在的工作即可为将来的建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打好基础。这一颇有远见的计划，也体现他的拳拳爱国之心。他怀着对抗战官兵的深挚感情，在医疗上总是精益求精。平时办公，他对报销单据之类，连看也不看就批上“OK”，交出纳去办；而对医疗报告，则总是认真审阅，从不放过。有一年圣诞节的傍晚，从前线转来一大批伤兵，救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因时间已晚，说病房已满，不予收容。伤兵们只好抖缩地躺在训练医院门口。时近半夜，林可胜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立即下山视察，当场大发脾气，命令立即停止欢庆圣诞的晚会，全体医护及事务人员紧急集合，打开训练示范病房，安置好全部伤兵，并煮粥给他们吃，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。林可胜的工作作风及其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感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，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颇多非议，唯独对林可胜专心任职及其“努力之精神”极其赞许，并主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1万元给救护总站。^①

1942年至1944年，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国到缅甸，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。这期间，由于战况紧张，他经常每日工作16个小时，真可谓身心交瘁。他因此多次得到中国政府的嘉奖，以及英、美政府的授勋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林可胜将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，调整改组为国防医学院，创建军医中心教育制度，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，同时还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

① 陈嘉庚：《南侨回忆录》，新加坡，南洋印刷社，1946年版，第211—212页。

所。

1948年，林可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。同年，蒋介石拟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，但他坚辞不就，而于1949年5月去美国。回想当年他怀着发展中国现代生理学的雄心壮志而慨然归国，他曾对亲密的朋友表示离开祖国的悔恨心情。^①到美国后，他先后任伊利诺大学客座生理研究教授、克莱顿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。1952年后，他又受聘于印地安那州迈尔斯实验所，负责生理、药理研究工作及医学科学研究指导。他一贯治学精勤，学风严谨，于生理学与药理学方面贡献尤著。早在30年代，他因发现“肠抑胃素”^②而著称于国际医学界。晚年在海外，对于疼痛及止痛机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，先后发表了10余篇论文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。世界各地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，聘请他为名誉成员。1961年，香港大学曾授予他科学博士名誉学位。

1969年7月8日，林可胜因患食道癌逝世于牙买加的京士敦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）

① 张锡钧：《回忆中国生理学先驱林可胜》，载《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》，第121页。

② 肠抑胃素是一种胃肠激素，是由食进脂肪后在肠内引起的。林可胜发现了这个物质，并为它命名“Enterogastrone”，至今仍被胃肠学家广泛引用。